



南

窑

窑

邓禾颖



主编

浙江摄影出版社

宋

南

窑



官

宋

邓禾颖

主编

浙江摄影出版社



初春枝头的一抹嫩绿，仲夏千峰连绵的碧色，秋后雨过天晴的青空，冬日雪花漫舞下的一畦绿蔬，这些对于整日穿梭在水泥森林之中的都市人来说，无不是一种奢侈的向往。踏青时节，偶尔约三五好友朝郊外一路行去，扑面而来的一片葱茏和林间倏忽掠过的一只翠鸟，常常使我们感动。

使我们更为感动的是人文绿色。

被自然天成的色彩感化的时空隧道的另一端，杰出的越国先民已然通过一种千锤百炼的技术，把大自然最具生命力、最美丽恒久的绿色融入泥土和火固化而成的智慧体——青瓷。这些遍及华夏大地南北诸多名窑的瑰宝，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散放出青釉特有的温润如玉的古韵，让我们在和古物零距离接触时，与古人的心灵产生共鸣。也正是因为陶瓷材质的特殊构造，令古陶瓷器物虽历经沧桑，仍可保留原有的形态和气质，成全了我们与古人亲切对话的机缘。

宋代是中国制瓷历史的高峰，源于宋人追求淡泊优雅的艺术风格、幽眇静定的艺术灵感。宋代官窑瓷更是从造型到纹饰、从胎釉到形制都具有严格的规范，做工极为考究。南宋官窑御用青瓷为青釉大系中独具特色的一类，其色泽淡雅清幽，莹润如玉，是古人尚玉、师法自然的巅峰之作，透着脱尽脂粉、洗去铅华的儒雅内蕴，令人叹为观止。

本图册集南宋官窑博物馆馆藏南宋官窑出土器之精粹，并以此为脉络，详尽阐述了南宋官窑的由来、发展、发现和发掘之旅，生动描绘了南宋官窑御用青瓷的历史起因、今日文物和遗址的保护情形以及南宋官窑博物馆近年来大规模的拓展、美好的构想和展望，娓娓道来，渐入佳境，如一道陶瓷文化大餐，引领读者朋友行走在青瓷传承和升华、发展的历程中，得到美的享受和精神的愉悦。

本图册力求突破一般图册重图轻文、重外轻内的窠臼，让读者朋友在欣赏、研读八百年前的文明碎片的同时，解构、探索其背后异常生动、鲜为人知的人文奥秘和工艺奥秘，共登如梦如幻、瑰丽无比的青瓷圣殿。

风，起于青萍之末，绵延千年生生不息；

梦，圆于“官博”之人，传承万载代代相随。

是为序。

制作陶器，似乎是人类天生具备的本领。进入新石器时代，几乎没有一个民族不会做陶。然理化性能均优于陶器的瓷器，则是中国人的独特创造。

世界瓷器起源于中国，而浙江则是瓷器的故乡。在中国，没有第二个地区像浙江省这样，有超过一半的县、市发现古代瓷窑遗址，数量多达近两千处；考古发掘表明，在中国十九个省份发现的全部瓷窑遗址中，年代最早的又在浙江省，故而浙江毫无疑问地被公认为中国瓷器的发源地。

我国瓷器滥觞于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乃至以前。在古越地，人们开始烧制外表施青釉的瓷器来替代青铜礼器。由于烧制的工艺技术条件尚不成熟，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所生产的这类青釉瓷器，被当今的古陶瓷专家定名为“原始瓷”。经过漫长的曲折而艰辛的探索和努力，在公元200年左右的东汉晚期，瓷器家族中的母亲瓷——青瓷终于率先在浙江宁绍平原的上虞一带烧造成功，完成了由陶至瓷的飞跃。东汉以后的青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着独盛的态势并历久不衰，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其历史之悠久、种类之繁多、适用面之宽泛，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上无与伦比。

一、回溯千年 官窑探源

青瓷自问世以来，便始终与历代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仅在民间被广泛使用，也为达官贵人乃至帝王纳入他们的豪奢生活。在东汉至宋代的一千多年间，青瓷始终是朝廷偏爱的瓷种，即便是瓷器生产达到巅峰的宋代，出现汝、定、官、哥、钧五大名窑，其中最为传奇和最珍贵的，也莫过于汝窑和官窑青瓷，故有学者称青瓷为瓷器史上位列第一的“帝王瓷”，这是丝毫不为过的。

从目前已知的文献记载看，最早被纳入宫廷用瓷的应是唐、五代时期的越窑青瓷。唐代瓷业的发展，使得瓷器制品的社会地位得到空前提升，不仅成为百姓生活中的必需品，还开始跻身于上层社会的生活领域，上层社会惯常使用的部分金银器、玉器等，亦逐渐被瓷器所代替。此时瓷器种类繁多，茶具、餐具、酒具、文具、玩具、乐器等生活实用器具乃至各种陈设艺术器，几乎无所不备。唐代时的越窑首创匣钵装烧法，不仅使瓷器釉面光洁，受火均匀，质量大为提高，且使得未经烧结的坯件免却负荷，为削减坯体自身厚度提供了先决条件，使原先的厚胎瓷器转变为模仿以模压



图一 唐秘色瓷净瓶（陕西法门寺博物馆藏）

法成型的薄胎金银器皿的形状和花纹，标志着瓷器品位的提高。越窑至晚唐五代时期形成了一个划时代的高峰，其最杰出的成就是烧制出了隐露精光、如冰似玉的秘色瓷。唐代诗人徐夤在《贡余秘色茶盏》中有“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之句，即是秘色瓷产品特性的最好注脚，它表明秘色瓷确是作为供奉之用的。（图一）

作为越窑青瓷上品的秘色瓷，其釉色之清雅、造型之简约，充分体现出贡瓷不惜工本、精工细作的特点。这种注重“类冰”、“类玉”釉色，在设计上着意于秀美造型的时代特色，为宋代青瓷追求高雅素净的美学风格奠定了扎实的技术基础。

有史料记载，五代后周皇帝柴荣在位时，主管烧造瓷器的大臣曾向他询问瓷器要烧成什么颜色，柴荣沉思片刻，挥笔蘸墨写下“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的诗句。显然，周世宗对于瓷器的审美取向亦在于青瓷。遗憾的是，这种“雨过天青”般的绝妙色泽最终未能烧出，倒是那句朗朗上口的诗句，留给后人一个尽情想象的空间。

宋代是我国瓷业大发展时期，南北各地窑场密布，宫廷用瓷的需求量较之以前有进一步增长。而越窑于北宋中期迅速衰落，由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向就地销售的小规模生产，产品制作也变得草率粗陋，与兴盛期的产品已大相径庭。

随着越窑的衰落，一个崭新的青瓷品种在河南民间兴起并迅速发展起来，这就是汝窑青瓷。汝窑无论在造型、装饰还是烧造工艺上都深受越窑的影响，制作工艺精湛，得到朝廷的青睐，成为宫廷首选用瓷。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中有“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唯用汝器”的记载。瓷器发展到宋代已呈百花齐放的局面，南北各地都有生产瓷器精品的窑场，或青或白或黑，品种各异，式样繁多，为何北宋朝廷偏会首选汝窑青瓷呢？

中国古代社会，在经历了汉代的强盛、唐代的繁华、五代时期的战乱，到了宋代，已进入了一个理性思考阶段。面对被历次战乱搞得日渐衰弱的自然环境和对前朝内乱的深刻记忆，宋人在哲学上选择了尊崇自然、倡导秩序的儒教性理学说，它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提出“存天理”而“去人欲”，追求简洁质朴的风尚，在艺术上则爱好幽玄苍古之趣。随着理学逐步居于统治地位，人们的美学观念也相应产生变化。例如在建筑上出现了以白墙黑瓦为主体的形式，榑枋梁栋，不设颜色，只用木的本色，甚至皇家御苑也“皆仿江浙白屋，不施五采”。在绘画上常采用清秀简洁的水

墨画和淡彩画形式。在服饰上的反映更为明显，整个社会舆论主张服饰不应过分豪华，而应当崇尚简朴，尤其是妇女的服饰，更应“唯务洁净，不可异众”。(图二)宋代的家具绝大部分呈现出一种极其简约的结构形态和极其素雅的装饰风格，简约到了无以复减，减之即毁的地步，从而体现了宋人以简洁为美的观念。尤其是南宋时的家具，因受南方竹文化的影响，构件断面往往尺寸极其细小，整体比例优美、文雅、清秀。

宋朝的理学思潮折射到瓷器艺术风格上，就是讲究细洁净润，色调单纯，趣味高雅，追求内在韵味。汝窑青瓷的显著特征之一，正是在于它不以繁缛的装饰纹样来美化器物，而是以釉质、釉色取胜。汝窑的出现，为北宋官窑的建立打下了技术基础。(图三)

南宋人叶真在其笔记《坦斋笔衡》中有这样的记载：“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是迄今我们所掌握的最早也是唯一的关于官窑建立的记载。从中可知，陶瓷史上的官窑制度始创于北宋徽宗的政和年间。从传世的北宋官窑器看，它专仿汝瓷，但与民汝产品相比，官汝瓷更讲究色调的幽雅和造型的精巧，弱化装饰效果，产品以素面为主，胎较薄，施单层釉，大多采用满釉裹足支烧，做工精湛，釉层莹润，如冰似玉，光亮匀净。由于官窑是为烧制御用瓷器而专设的，故它的命运与朝廷的兴亡紧密相连。随着北宋王朝的覆灭，北宋官窑自然不复存在。如此算来，该窑口最多也只有十几年的烧造史，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它在陶瓷史上的地位。遗憾的是，由于黄河在历史上几次大的泛滥、改道，官窑窑址与汴京城一起被掩埋于泥沙之下，北宋官窑窑址所在便成为陶瓷史上的一大悬案，至今未能形成明确的结论，令人扼腕叹息。

二、宋室南渡 官窑重建

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难”，徽、钦二帝被俘，北宋灭亡。赵佶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自立为帝，改年号为“建炎”，史称“南宋”，赵构就成了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即宋高宗。在金兵的追击下，高宗举行登基典礼完毕立即逃命。他被金人从中原追逐到长江以南，又从临安府(今浙江杭州)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甚至栖身于沙船之上，沿着海岸线往来，以避免被擒。直到建炎四年(1130年)，他才北返越州，以其地为行都。次年改年号为“绍兴”，升越州为绍兴府，以示“绍继中兴”之志。但绍兴二年(1132年)高宗又搬回临安。在其后的几年时



图二 宋《半闲秋兴图》中的仕女装扮



图三 北宋汝窑青瓷盘(英国大英博物馆藏)

间里，抗金将领们连续收复失地，抗金形势日趋好转。高宗在许多大臣的促动下，树起“抗金”旗帜，驻蹕建康（今江苏南京），宋金出现了对峙局面，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南宋半壁江山开始稳定下来。绍兴八年（1138年），逃难多年的高宗从建康返回，正式定都临安。

由于“靖康之难”中宋朝宫廷的礼器法物及日常用器被金人席卷而去，故朝廷初到江浙时，对瓷器的需求量相当大，除了满足宫廷日用之需，还要大量用作祭祀礼器。学界通常认为，南宋初朝廷对陶瓷祭器的倚重是由于当时的财力薄弱、铜料稀缺，无法大量重铸渡江时已尽毁的铜、玉礼器，故绍兴年间的祭典活动多数祭器从俭，改用陶瓷器及木器。以《咸淳临安志·郊庙》记载为据：“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纁代之。”显然，财力、时间、精力都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宋代成规模地制造陶瓷祭器并非始于南宋初年，而是在北宋中后期便已开始。宋《郊庙奉祀礼文》曰：“礼院仪注。庆历七年，礼院奏准修制郊庙祭器所状……臣等参详古者祭天，器皆尚质，盖以极天下之物，无以称其德者……今伏见新修祭器改用匏爵、瓦登、瓦甬之类，盖亦追用古制，欲乞祭天神位……故扫地而祭，器用陶匏，席以藁秸，因天地自然之性。”宋元丰六年（1083年），臣僚亦曾上言讨论礼器制度，神宗再次下诏将部分礼器改用陶器：“元丰六年，详定礼文所言：‘本朝昊天上帝、皇地祇位、太祖位各设三牲，非尚质贵诚之义。请亲祠圜丘、方泽正配位皆用犊，不设羊豕俎及鼎匕，有司摄事亦如之。又簠、簋、尊、豆皆非陶器，及用龙勺。请改用陶，以榘为勺。’”以上文献均强调以陶瓷器作祭器是为体现古礼“尚质贵诚之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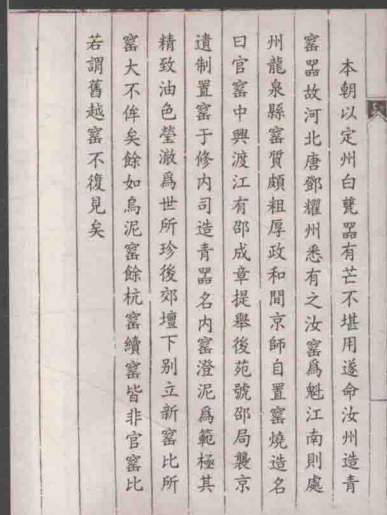
众所周知，为迎合皇帝个人喜好，制瓷工匠们在日用瓷和陈设瓷的构思上别具匠心，追求新、奇、特的艺术造型。但制作替代铜、玉器的祭祀礼器，在造型设计上是绝对不可随心所欲的，必须严格按三代礼器的形制制作。文献资料表明，礼器图的传承，从东汉以来就有一个不断修正和完善的过程。与之相对应的是，宋徽宗大观年间，君臣有感于当时的礼器不合古制，于大观元年设议礼局，着手搜集礼器形制，以备日后改造礼器之用。政和三年（1113年）罢议礼局置礼制局，并于同年新造了一批力仿三代的礼器，当时称这批新做的三代之器为“新成礼器”。这恰与叶真“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的记载相吻合，由此可判断徽宗于政和间首创的官窑制度，乃属礼制局所辖的陶瓷烧造机构，主要目的是为了烧造合

乎三代形制的陶瓷礼器，同时也应包含宫廷的日常用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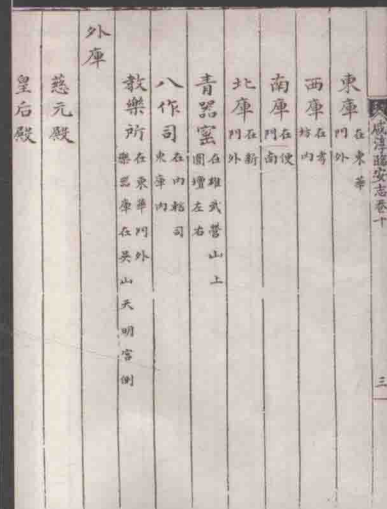
从《中兴礼书》等古籍中的相关记载可以看出，由于这些“新成礼器”在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渡江时“尽皆散失”，与之一同消失的很可能还包括《三礼图集注》和《宣和博古图》等可依照的礼器图样，因此，在宋室南渡之初的十余年间，宋廷上下都将注意力集中于完备各种制度和相关的器物，尤其是制作礼器上。高宗认为：“三代礼器，皆有深义。后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意。朕虽艰难，亦欲改作，渐令复古。”朝廷在为礼器制度的“不古”而苦恼的同时，积极计划改造。所幸的是，在礼官的不倦努力下，太常寺终于在绍兴十三年（1143年）二月及四月重新颁布《宣和博古图》以改造祭器。高宗于绍兴十四年（1144年）七月八日谕宰执曰：“国有大礼，器用宜称。如郊坛须用陶器；宗庙之器，亦当用古制度。卿等可访求通晓礼器之人，令董其事。”同年成立礼器局，参照《宣和博古图》等开始改造陶瓷祭器，这表明了高宗对神宗和徽宗所确立的祭祀天地“须用陶器”原则的全盘继承，也是南宋“袭故京遗制”在京城临安重设官窑的首要原因。

由此可见，北宋时始创并被南宋朝廷承袭的官窑制度，与当时推行的以陶瓷作礼器以体现古礼“尚质贵诚之义”密切关联。这种特殊需求，必然要求朝廷自行建置并派官直接管理窑场，其产品完全按照宫廷要求生产并仅限于宫廷使用，这与之前由各地民窑烧造瓷器进贡朝廷的贡窑模式显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有关南宋官窑的文献记载，最可靠也是最为翔实的有南宋叶真的《坦斋笔衡》和顾文荐的《负暄杂录》。二书内容、遣词用句和行文顺序等都大体相同，仅个别地方有异。这里选择叶真的记载：“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根据叶真的说法，南迁后的宋皇室曾先后在京城设置两处官窑，一处是在修内司，当时称为“内窑”；一处是在皇帝祭天的郊坛附近。而“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十六字则高度概括了南宋官窑青瓷的特征，我们从中可以体味出其产品绝不亚于北宋徽宗使用的官窑青瓷。（图四）此外，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中有“青器窑在雄武营山上圆坛左右”之句，可与叶真的记载相印证。（图五）



图四 《辍耕录》卷二九《四部丛刊》“窑器”条下引叶真《坦斋笔衡》



图五 《咸淳临安志》内页书影

三、发现官窑 窑址概览

对于南宋史料的记载，后人一直心存疑窦。随着元末张士诚重筑杭州城，凤凰山被截于城外，南宋大内及其附近地区从此成为荒烟乱坟之地，窑址之说变得扑朔迷离，成为陶瓷史上的一大谜案。

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野外作业为标志的近代考古学传入我国，杭州南宋郊坛下官窑有幸成为当时最早被发现的古窑址之一。1930年，日本人小笠原彰真在乌龟山南麓发现了南宋郊坛下官窑窑址迹象，并采集了大量瓷片标本。时任日本驻杭州领事米内山庸夫等人对文献中所记述的南宋官窑做了多次地域勘察，并采集了不少瓷片和窑具。我国政府得知情况后，立即派我国最早从事古陶瓷科学研究的中央研究院的周子竞（周仁）先生等人先后三次到实地调查，写出《发掘杭州南宋官窑报告书》，提出乌龟山官窑“为内窑似无可疑”的观点。1937年，朱鸿达先生在调查采集的基础上编写出版了《修内司官窑图解》，认为乌龟山官窑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南宋官窑。（图六）此后，中外考古界、陶瓷界学者纷纷前往窑址调查或采集标本，希望搞清南宋官窑的真面目。米内山庸夫于1952年至1954年又亲自前往窑址考察，并将采集到的瓷片和窑具进行整理，撰写了《南宋官窑的研究》一文，在《日本美术工艺》杂志上连载。但由于未进行科学发掘，人们对窑址的范围、结构、作坊布局、生产设备与产品种类等仍不清楚。

乌龟山是一座东西长300米，南北宽200米，海拔高度76米的小山丘，山上有紫金土、瓷石等制瓷原料，四周林木茂盛，燃料资源丰富，青瓷生产的自然条件良好。窑址三面环山，东北距皇城约2公里，西面紧邻南宋籍田八卦田。郊坛和八卦田都是南宋王朝的圣地，闲杂人等不得进入，此处的确是理想的建窑之地。1956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窑址的南部进行了首次局部发掘，清理出23.5米长的龙窑一座，并发掘了窑旁的部分瓷片堆积。该遗址发掘后已回填。（图七）198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联合组成的南宋临江城考古队，对郊坛下官窑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和钻探，并在1985年冬至1986年春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出练泥池、成型、上釉、素烧炉等作坊遗迹和一座长约40.8米的龙窑，以及三万余片瓷片与窑具标本。整个遗迹较全面地反映了从练泥、成型、修坯、上釉、晾干到素烧、入窑装烧等一套完整的瓷器制作工艺流程，构成了南宋官窑生产全景。（图八）



图六 《修内司官窑图解》书影



图七 1956年发掘的龙窑全景



图八 1985年发掘的龙窑全景

在获得南宋郊坛下官窑大量考古实物资料的同时，考古界、陶瓷界对

文献记载中的另一处官窑，即修内司官窑究竟是否存在更加密切注意。加上20世纪80年代在杭州中河南段(该区域南宋时属皇城范围)修建时，曾有一些官窑型瓷片和窑具发现；1996年，在万松岭脚下杭州卷烟厂工地也曾出土大量集中堆积的南宋官窑瓷片；此后，在杭州老城区的建设过程中又陆续发现过一些官窑型瓷片……这些发现激发了许多古陶瓷爱好者寻觅修内司官窑的热情。

1996年春，在杭州凤凰山与九华山之间的山岙中，一处被当地人称为“老虎洞”的地方，由于雨水的冲刷，有大量黑胎青瓷残片和窑具暴露在外，后逐渐流散到杭州的古玩市场，部分瓷片甚至远渡重洋到了海外。直到同年9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获悉情况后，采取措施对现场进行二十四小时监管看护，瓷片的盗挖外流才得以杜绝。随后，考古人员对该地域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古调查，并按当地人的俗称将它定名为“老虎洞窑址”。该窑址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南宋时此处就是修内司营驻地，这恰与文献中记载的南宋修内司官窑相吻合。此后至2001年，考古部门先后对该窑址进行了三次考古调查与发掘，比较全面地揭露了这一包括南宋和元两个时期的青瓷窑址。(图九)其中南宋层发现了采矿坑、澄泥池、房基、道路等遗迹，并清理瓷片堆积(坑)二十四处，出土了数以万计被人为砸碎的瓷片及窑具。瓷片有厚胎薄釉和薄胎厚釉等，胎色以深灰为主，釉色则以灰青为主，造型规整，制作精巧。(图十)专家们在对发掘的遗址和实物资料进行充分论证后，认为它就是南宋时期烧造御用瓷器的窑场，但对它究竟是否为修内司窑仍存疑虑。

疑问到了2006年终于有了突破口。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在对发掘的瓷片进行五年多的整理，修复了四千多件瓷器后，一件施粉青釉的荡箍(系陶车上的一个部件)赫然出现，在其表面刻有“庚子年……匠师□记修内司窑置”的铭款。(图十一)事实表明，南宋修内司窑是客观存在的，其窑名也并非后人杜撰，“内窑”的称谓就是修内司窑的简称，这可能与修内司在宋朝常被简称为“内司”有关。老虎洞南宋层即为修内司窑。

四、技艺传承 青风绵延

两处窑址出土的大批碎片，于八百年后重见天日，让今天的人们得以领略一个时代的文化艺术之精华。与北宋官窑一样，南宋官窑既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又主要服务于朝廷，因此必然秉承朝廷的意志，体现



图九 老虎洞窑址作坊遗迹



图十 老虎洞窑址瓷片堆积坑



图十一 铭款荡箍

出统治阶级的审美情趣。

南宋官窑瓷器显著的特征之一是釉面的天然开片。所谓开片，是指瓷器釉面出现的不规则裂纹。这种开片原本是由于瓷器胎体和釉料的膨胀系数不一致，而在烧成后冷却收缩时形成开裂。这本应属于技术缺陷，但缺点也可转化为美感，开片便是这种情况。不规则的裂纹，使南宋官窑的制瓷匠师们感到了自然现象的某种意蕴，遂将其展现于瓷器上，使之达到了意外生动的艺术效果。

这种崇尚天然之美的审美意识还促使南宋官窑的匠师们以追求天然美玉般的釉色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玉具有色泽温润、表里一致、坚而不弯等美德，因此在中国一直深得人们的珍爱。古人常把它比作君子之德，《诗经》中就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之句。与北宋的官窑产品相比，南宋官窑产品胎更薄，很多瓷片的胎壁薄如纸，最薄的只有1毫米，衬得瓷器轻巧优美；釉更厚，显得更加晶莹润泽、色美如玉。（图十二）要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在制作过程中有两个关键环节：

一是需要重复上釉。匠师们为了赋予其作品温润肥厚的玉质感，经过反复实践，不断积累经验，终于在原有工艺基础上，创造了素烧与多次上釉相结合的工艺。在修坯和上釉两个生产环节之间增加一道素烧工序，将修制后的坯体先在低温中素烧，增加坯体的强度，以强化坯体对釉的吸附力，然后再施釉。在南宋官窑的两个遗址区域内，都发掘到了大批素烧坯件及用作素烧的马蹄形窑炉。有些已经上釉的坯体，釉层最厚可达四层之多，说明这类瓷器需要经过三至四次烧制和上釉的复杂工序。其过程可能是：第一次坯体素烧→上第一次釉→第二次中温釉烧→上第二次釉→第三次中温釉烧→上第三次釉→第四次中温釉烧→上第四次釉→在龙窑中高温本烧。经过这样复杂的工序烧出来的瓷器，才出得了釉层厚如凝脂的理想效果。

二是注意温控。瓷器作为陶器的更新换代产品，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在于烧成温度。由于原料的不同，陶器的烧成温度一般控制在 800°C — 1100°C ，一旦超过便极易成为废品；瓷器的烧成温度则要达到 1300°C 以上。而南宋官窑青瓷为产生玉质感的效果，在增加釉层厚度的同时，还必须将温度控制在 1300°C 以内。这是因为超过 1300°C 的完全瓷化器物，其釉面具有明显的透明玻璃质感，如此一来，便无法达到那种一眼望不透的温润的乳浊效果。出土于南宋官窑两处窑址的青瓷标



图十二 薄胎厚釉瓷片

本，经科学测试，它们的烧成范围都控制在1150℃—1270℃之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南宋官窑青瓷只能算做半瓷化产品。

汝窑器的胎以香灰色为基本色调，胎中氧化铝含量较高。铝含量的提高可增强胎的抗变形能力，从而能制作出轻薄优美的瓷器。而南宋官窑瓷胎则普遍呈灰黑色，它用瓷石和紫金土两种原料配合而成，不仅富含氧化铝，氧化铁的含量也相当高。在郊坛下和老虎洞两处窑址附近都可以找到这两种原料的矿藏。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已经有了高铝质的优质瓷土，可呈现汝官瓷器的那种香灰色，为何又要掺入含铁量高的胎料，让胎呈现并不美丽的灰黑色？笔者以为，这或许与追求玉质感的目标有关。从实际效果看，这种深沉的色调恰好能为青色的釉面起到衬托作用，使之更好地呈现玉质效果。

在南宋官窑釉料的配方中，增加了钾和钠两种碱性金属作为助熔剂，从而将传统的石灰釉改变为石灰碱釉。石灰釉的高温黏度较低，易流釉，故只能产生薄釉瓷器。而钾和钠可以增加釉汁的高温黏度，在有效控制高温流釉、增厚釉层的同时，还能在微生烧的条件下使釉层内部充满细微的气泡，这些气泡可以增加釉层对光线的散射作用，使瓷器的釉面显得柔和莹润。

专家们经过对南宋官窑青瓷标本的排比研究，发现南宋官窑产品早期以薄胎薄釉为主，中后期则以薄胎厚釉为主。由此可见，厚釉和玉质感的艺术效果是逐渐发展起来的。

早期产品受北宋官窑的影响较大，主要表现在薄胎薄釉和支钉支烧上。以郊坛下窑出土标本为例，瓷器壁薄胎细，胎色有浅灰、灰、深灰等多种，胎外上一层粉青、青灰或米黄色薄釉，其中米黄色不在少数，说明此期窑工的烧瓷技术尚在摸索阶段。碗、盘、洗等圈足器的圈足高而外撇，并用支钉支烧，外底釉面留有针尖状的支钉痕迹。

随着南宋政权逐渐稳固，对宫廷用瓷质量要求提高，官窑的工艺技术也在不断完善。为追求青瓷玉质感而采用的多次素烧、多次上釉工艺，使器物的釉层大大增厚，这促使窑工改革窑具，将支钉改成垫饼，以免烧成时支钉被厚厚的釉层黏住，变成残次品。垫饼的采用，需将器足底端的釉层事先刮去，瓷器的底足在烧成后就显露出一圈比较规整的紫褐色胎，宛如真铁一般；而器口部位的釉汁在窑内高温下向下流淌，釉层变薄，也从釉层下隐现出紫褐胎色，这就是被后人广为推崇的“紫口铁足”现象。

南宋官窑制瓷工匠的技高一筹之处，在于他们通过细致纯熟的制作工艺，将简练流畅的造型、精光内蕴的釉色、匠心独运的纹片以及别具意趣的“紫口铁足”和谐地统一于南宋官窑青瓷中，使之毋庸置疑地屹立于中国古代青瓷生产的巅峰。由于它产量有限，传世更少，成为中国古代瓷器中的珍品。它的仪态和风范，为后代制瓷业所推崇、赞叹和追仿。

五、遗址的保护与展示

南宋官窑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上珍贵的艺术宝库，也是南宋时杭州作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的历史产物，是再现南宋时代的重要载体。两处遗址从制瓷原料的开采、加工，到产品制作、烧制完成，通过一整套完备的制瓷工艺，向人们展示了官廷用瓷烧造的全过程，丰富了人们从传世品中获得的对南宋官窑的认识，为研究宋代官窑的生产工艺流程、生产能力和产品特征等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窑址中出土的产品真实体现了当时青瓷的最高水平，是探讨南北瓷业、官民两大体系瓷业文化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环节。

这两项在全国瓷窑址考古史上罕见的发掘成果引起了中外古陶瓷学界及广大陶瓷爱好者的广泛关注，杭州市政府对此也十分重视。早在1962年，郊坛下官窑遗址即被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杭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全面而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一项旨在保护我国著名历史文化遗产、弘扬古陶瓷文化、丰富杭州历史文化名城内涵的南宋官窑博物馆建设工程也随之拉开序幕。南宋官窑博物馆于1991年秋建成并试开放，次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是国内首座依托古窑遗址建造的陶瓷专题馆。建筑形式采用宋代风格的短屋脊、斜坡顶式样，造型庄重古朴，体现了官窑既是皇家专设，又是手工作坊这一特定地位和历史风貌。（图十三）展览包括南宋官窑历史文物陈列厅和郊坛下官窑遗址保护厅两个部分。在南宋官窑历史文物陈列厅内，两百余件南宋官窑出土修复器在聚光灯的照射下，泛着独有的青色光泽，优雅而静谧。博物馆将它们放置在南宋古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融历史性与艺术性为于一体，使观众对南宋官窑及其所代表的南宋文化产生深刻的印象。（图十四）



图十三 南宋官窑博物馆



图十四 南宋官窑历史文物陈列厅

在郊坛下窑址上建有约1400平方米的保护厅，是国内少有的大型文物保护建筑之一。大厅采用大跨度的钢质网架结构，将发掘时揭示的南宋官窑生产工艺流程包罗其中，使遗址得以妥善保护和展示。厅内分为作坊和

龙窑遗迹两个区域，用木结构围栏圈围，观众可凭栏观望，并借助各遗迹点的简要说明，遥想八百年前这里曾经拥有的辉煌。保护厅建成后的十余年中，接待了来自国内外的三十余万观众，为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图十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方地区土遗址保护中具有共性的难题——因多雨、潮湿及地下水位高而造成的对遗址的侵害问题也日益凸显。与发掘之初相比，某些遗迹点日渐模糊，且一直得不到有效控制和处理。针对这一状况，在2002年实施的博物馆陈列改造中，经考古、土壤专家充分论证，并借鉴国外遗址保护的做法，博物馆大胆采用了对作坊遗址总体覆土复原、局部原貌展示的方法。目前，遗址总体保存良好。(图十六)

老虎洞窑址的考古发掘，使人们对南宋官窑有了更新和更深入的认识。其第一次发掘即获得了199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提名奖，并于2000年被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杭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二次发掘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2年5月，作为南宋官窑的有机组成部分，老虎洞窑址被划归南宋官窑博物馆管理。同年10月，由杭州市政府出资九十余万元建造的老虎洞窑址初步保护开放设施完成并对外开放，建有木结构保护棚三座，展示龙窑、作坊、素烧炉、瓷片堆积等南宋官窑遗迹十五处，各遗迹间用木构架栈道相连，游人可漫步其上探寻这片神奇的古窑世界。沿路还设有排水明沟以保护遗址。(图十七)

2005年，郊坛下窑址与老虎洞窑址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合并公布为第五批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6月，又被国务院合并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宋官窑博物馆建成开放后，在保护遗址和出土文物、展示其历史内涵的同时，一直致力于依托发掘成果，恢复和发展南宋官窑传统工艺。博物馆成立了专门的研制组，并购置了现代化的实验及生产设备，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和磨砺，南宋官窑的仿制品达到了国内较高水平，曾先后获得杭州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和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其仿制品严格以郊坛下和老虎洞两处窑址的发掘资料为依据，力图真实地再现南宋官窑青瓷的风姿神韵。如仿郊坛下官窑遗址出土的花口壶、贯耳瓶和仿老虎洞官窑遗址出土的玉壶春瓶、琮式瓶等，都堪称形神兼备的仿官精品。目前，南宋官窑博物馆的仿制品已从科研转向生产，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图十八)



图十五 郊坛下窑址保护厅内作坊遗迹



图十六 改造后的作坊遗址



图十七 老虎洞窑址保护开放设施



琮式瓶



贯耳瓶



玉壶春瓶

图十八 南宋官窑博物馆的仿官精品



图十九 陶艺活动



图二十 中国陶瓷文化陈列

除了内容丰富、格调高雅的陈列外，博物馆内还设有一处情趣盎然的手工制陶作坊，人们可在此亲身体验古代陶瓷艺人用泥与火创造陶瓷文化的艰辛与乐趣，创作富有个性的陶艺作品。陶艺活动突破了传统博物馆只能用眼看不能动手做的局限，尤其受到青少年的喜爱，目前已成为博物馆与参观者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互动环节。(图十九)

南宋官窑博物馆的建成和开放，对宣传陶瓷文化、凸显杭州特有的以南宋官窑为主题的陶瓷历史积淀，起到了良好的展示和传播作用。南宋官窑这一历史遗迹也从鲜为人知变为在杭州具有相当的知名度，成为杭州陶瓷文化的代名词。如今的南宋官窑博物馆，在充分展示南宋官窑艺术精华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内涵外延，精心打造“中国陶瓷文化陈列”，标志着博物馆自身建设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图二十)随着杭州城市建设由西湖时代向钱塘江时代的迈进，博物馆新一轮的扩建工程又将拉开帷幕，该工程定位为以展示现代陶瓷艺术为主的陶瓷文化休闲区。届时，整个馆区的占地面积将达到60亩，全馆将形成以郊坛下官窑遗址为中轴线，西侧展示古陶瓷文物，东侧为陶瓷文化休闲区域的空间布局，实现博物馆以南宋官窑为立足之本，向陶瓷文化大观园拓展的圆满结局。

“古色生香，中华陶艺多神品；名山发覆，南宋人文一大观。”作为展示杭州南宋文化的代表，南宋官窑博物馆必将在西湖南缘的青山翠谷中发出更耀眼的光芒。

南宋官窑博物馆馆长 邓禾颖

Inheriting and Upgrading Celadon

— In Retrospect of the Official Kiln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Almost a human instinct, pottery-making has been mastered by virtually all nations since the Neolithic Age. However, porcelain, superior to pottery physico chemically, is a uniqu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Porcelain originated in China and Zhejiang is its hometown. No other province can match Zhejiang with its 2000 ancient kilns, which were discovered in more than half of its cities and counties.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archeological studies, Zhejiang was the earliest among the 19 of china provinces with ancient kilns.

Dating back to over 3000 years ago, the Shang Dynasty witnessed the first porcelain. In the ancient State of Yue, people began to replace ceremonial bronze ware with blue glazed porcelain. But due to immature technology and poor working conditions, our forefathers could only produce primitive porcelain. After a long and hard exploration, the celadon, or the mother of all porcelain, was at last successfully fired in Ningbo-Shaoxing Plain in 200 AD, marking a historic leap from the era of pottery to that of porcelain. Celadon thrived alone as a mainstream in China ever since, incomparable in terms of its variety, usage and long history.

1. The Official Kiln a thousand years ago

Celadon has been widely used by the local people and nobles alike since its birth, becoming the favorite of the royal courts during the 1000 years between Han Dynasty and Song Dynasty. Even in Song Dynasty, when porcelain culminated in variety with the operation of the five famous porcelain kilns- Ru, Ding, Official, Ge, Jun, the most precious and wonderful specimens were still celadon from Ru and Official kilns. Thus, it is not at all surprising that celadon is called the "Imperial Porcelain".

The earliest royal celadon was produced in Yue Kiln during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from 8th to 10th centuries)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And the quick development of celadon production in Tang Dynasty not only raised the social status of porcelain, but also made it a daily necessity. It therefore enjoyed a boom among the upper class. Gold and silver, jade, preferred by the ruling class, were gradually replaced by porcelain articles, which penetrated every field of life. There were tea sets, dinner sets, stationery, toys, musical instruments, artifacts, etc. Saggar firing was invented in Tang Dynasty to bake celadon more evenly and lustrously, to lessen the burden on the unburnt body so as to make it thinner, in imitation of the shape and decoration of the high-brow mold pressed gold and silver ware. Yue Kiln culminated in around 900 AD in its invention of glassy and jadelike Strange Color Porcelain, which was highly praised by the Tang poet Xu Yin. Xu's poem was considered the best notes for this porcelain, certifying it as the royal sacrificial articles.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Yue Kiln porcelain, Strange Color Porcelain